

民众生物信息立法保护迫在眉睫

□沈彬

不经意间,刷脸付费、指纹验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我们也将许多属于自己的、具有唯一性的面部表情、指纹、虹膜等生物信息交给外部世界,这些信息能够得到妥善保存、依法使用以及定期销毁吗?

多年前,公众对留指纹等行为的警戒

值比较高。比如,2010年,在教育系统推行的冬季长跑活动中,拟规定大学生长跑要通过“指纹打卡”的方式进行验证。这一规定引发舆论强烈反弹,公安部表态称:其他部门是否可以采集民众指纹,没有查到法律依据。此事不了了之。近9年过去了,指纹解锁、刷脸支付、虹膜扫描等生物识别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公众的警戒和抵触情绪有所弱化,但是相关的立法却迟迟没有跟进。

技术下沉使用,很多问题便显现出来。像人脸信息被采集之后,到底归属于谁?会不会变成企业的资产,任由其买卖?如果企业倒闭、注销,如何依法销毁相关生物信息避免外泄?这些都需要通过法律把企业和政府权力关进笼子里。

就在近日,美国旧金山市通过了

《停止秘密监视》条例所作的一些修订,条例强调:“人脸识别技术侵害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了其声称的好处。”这意味着,美国第一个城市禁用人脸识别软件将成为现实。美国参议院也正在考虑一项监管人脸识别软件商业使用的法案。此外,欧盟在4月初抓紧公布了AI(人工智能)伦理指导方针,要求公司和政府机构在未来开发AI时应遵循7大原则。

在我国既有的法律“大厦”之中,还没有给个人生物信息留下合适的位置。首先,目前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中应该给大数据时代的民众个人信息留下位置,夯实生物信息作为私权的根基。其次,应该明确政府部门使用、匹配、存储民众生物信息的权限、程序和责任。目前生物信息被普遍用于刑事侦查、治安管理、人口治理、医疗卫生等领域,但是并没有法律的详细规定;如何防止被权力滥用?这方面的程序性和限制性规定,也应尽早进入立法议程。最后,对民众生物信息的财产性部分,也应该作出保障,对商业性开发的目的、范围和手段,应该有约束性规定,特别是要防止一些科技巨头滥用民众生物技术信息库的行为。(摘自光明网)



我不给孩子设条条框框

人生感悟

□李松蔚

父母常常数落我的睡眠习惯。他们告诉我早睡早起有很多好处,还拿出他们年轻时的表现作为范本。最让我动容的一句话是:“就算不为你自己的健康负责,也该为孩子的身体想一想!”的确,我女儿不到5岁,经常晚上10点、11点上床睡觉,我也没有催促她的意识。反观我上小学以前,就养成了每天晚上不到9点就入睡的习惯,的确是靠父母以身作则。日复一日,雷打不动。

我有时也不理解他们:“你们每天那么早睡,不会不甘心吗?”“会啊,谁不想玩。”他们说,“但为了健康嘛!”

我对健康并没有那么大的焦虑。我又问:“那你们是觉得晚睡几个小时就要生病吗?这种观念是医生说的还是哪里来的?”

他们说不上来。母亲说:“小孩子睡不够的话,长不高!”我女儿长得也不矮。父亲又提出新论点:“早睡早起本来就是一种好习惯!”

“可是确实有很多事情想做。”“你熬夜做的都不是正事。”父亲一眼看穿了我,“玩手机,打游戏,有什么用?有时间不如第二天早起做点正经事,比如早起锻炼。”

“我也可以晚上去健身房啊。”我说。这些在他们看来都是胡闹。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思维定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起居规律,好像唯有如此才能维持某种恒定感。

他们看不惯我的“折腾”“胡思乱想”。他们总是担心我的健康,前途会被吊儿郎当的个性毁掉。他们有时责怪我太马虎,不用心,做不好一个父亲。在我女儿这么大的时候,被迫认识了全套汉语拼音、几百个字,背好多首唐诗,好像还会20以内的加减法。而现在我什么都没教给孩子。

有时候我也站在床前,看着女儿歪七扭八的睡相,想起我小时候的那些条条框框。我忍不住想:长大以后你是什么样?会比现在的我更自由吗?

我猜,我的父母看到这一幕,一定会微微摇头叹气:“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它干啥!快睡!”我理解,也特别想抱一抱他们,说声“谢谢”。(摘自《难道一切都是我的错吗?》)

文化记忆

□王莹莹

“95后”江安是喊着防火口号长大的。他出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小镇伊图里河。从上小学起,只要进入防火期,学校都会组织防火宣传活动。

伊图里河位于大兴安岭腹地,林业资源丰富。“当时为了发展林业才建的这些城镇,”江安说,“城镇里基本上所有的职能部门,包括学校、医院等,都归林业局管辖。不管你是医生还是老师,基本都能叫林业职工。”虽如今已经改制,但不变的是,防火“是在一切工作之上的、最重要的工作”。

对此,黑龙江漠河市图强镇防火指挥部副主任马坤同样深有感触。以前,触响警报的是5级风。“禁止一切野外用火,电也不行。”那时大多是平房。5级风的警报一拉,家里就不能生火做饭了。若此时谁家烟囱还在冒烟,消防车会直接向烟囱里灌水。

“当时没有手机能看天气预报,每当风大的时候,镇里的消防队就会拉响警笛,长长的一声表示不许烧火,相对短的几声表示解除警报。没有警笛的林场,会升起一面旗,告诉大家超过5级风。”生活在漠河的王玉玉还记得,为了防止饿肚子,林区人会“观天象,做准备”。如果天空中出现了像细小的鱼鳞般的卷积云,第二天有很大概率会起风,小吃铺也会提前多做几个包子、馒头,大家都会有意识地多买一些放在家里。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火灾发生后,

生活百科

□李茹恬

微信中关于“防癌食品”的文章数不胜数,然而,作为一个理智压倒一切的肿瘤科医生,我的观点是:世上根本就没有大家所期望的“防癌食品”。

癌症是一种典型的年龄相关疾病,其发生机制,简单说来,就是机体细胞的一些小错误的积累,当突破一定阈值时,就会发生癌症。

年龄越大,机体的犯错越多,肿瘤发生率越高。就好像一个机器,用得越久,越容易坏掉。同样的年龄,犯错频率越高,肿瘤发生率越高。就好像一个机器,越不注意养护,越容易坏掉。

而所谓的“犯错”,对于大部分人而言,

不存在所谓“防癌食品”

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

饮食和肿瘤的关系,绝大多数是负性



相关,但是目前公认的致癌物质,并非来源于民间的所谓“饮食禁忌”,而是来源于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致癌物分类表。其中,1类致癌物(明确有致癌作用的)包括了,酒精、黄曲霉素(霉变食物)、烟草、亚硝胺(腌制食品)、马兜铃酸、槟榔等。

以上这些物质致癌,还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时间。任何的致癌物,都是通过长期作用于人体,才会最终以“助封为虐”的方式,促进癌症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想降低癌症的发生概率,一个人应当做到的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吧、不经常撸串。这与其说是饮食禁忌,不如说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摘自《扬子晚报》)

网海观潮

□朱昌俊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通知,决定于2019年4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守护消费”暨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动,重点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这次被要求治理的“多发高发的重点行业和领域”,像房产租赁、小贷金融、保险基金、装饰装修等,基本都是属于骚扰电话“重灾区”。可以说,将这些领域的骚扰电话现象治好了,对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的治理或许就成功了一大半。

在网上检索可发现,近段时间反映骚扰

电话、垃圾短信越来越多的声音,不在少数。有网友调侃,手机短信的唯一功能,就是接收垃圾短信。也有网友认为,骚扰电话数量,可能对应着经济景气指数。一些数据可以作证。在今年的“3·15”晚会上,被曝光的一家提供外呼系统的公司负责人透露,利用智能机器人拨打骚扰电话,一个机器人一天能打5000个电话,是一般人工的10倍以上,有公司在一年多时间内所打出去的骚扰电话就超过40亿。而《2014骚扰电话年度报告》显示,当年的骚扰电话总数为270亿。如今搭载智能机器人的“东风”,骚扰电话越来越多已经是事实。

这道出了一个尴尬现实:在既有问题未被有效解决的情况下,骚扰电话反倒借助新技术完成了自我升级。不仅电话的拨打效率空前提高,某些电话营销软件还直言:“没客户资源了,系统还会自动生成。”这意味着,在手机安装屏蔽软件和系统来反骚扰电话的“传统”做法已形同鸡肋。

事实上,从经济效益来讲,电信运营方从来就是骚扰电话的受益者。为赚取“可观”的电话费,某些运营商不仅积极给各类电销公司提供优惠套餐,对异常号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帮助电销公司“复活”被骚扰软件拦截的号码。也就是说,在消费者权益保障,以及相应管理责任落实,未能对运营商形成足够压力之前,囿于经济

效益的诱惑,其解决骚扰电话问题的动力,其实严重不足,甚至还可能充当“内鬼”。而在当前的网络流量时代,通话、短信市场日益萎缩,“骚扰”电话、垃圾短信可能愈发成为电信运营方的营收工具。所以,寄希望于运营商主动向这种灰色收入切割,并投入更大的资源去升级屏蔽技术,显得不切实际。

但骚扰电话并非不可治理。国外的“谢绝来电”机制时常被拿来作为他山之石。如在美国,明确不愿接听营销电话的电信用户,会有专门的注册登记渠道,一旦营销企业或个人违反规定对这类用户造成了电信骚扰,用户可通过《谢绝来电实施方案》获得保护;依据电话营销与消费者欺诈及滥用防范法,对不法分子电信诈骗行为可处以超过10万美元、监禁多年的处罚;企业如若违规拨打,最高将会被处以每次1.6万美元的罚款。

中国未必一定要照抄国外的“谢绝来电”机制,但国外的经验至少证明,骚扰电话是可以被有效治理的。今年全国两会提案,搁置多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已被纳入本届立法规划。它能否给骚扰电话治理扫清障碍,或许值得期待。

而就现实来看,打造属于中国的“谢绝来电”机制,不应该再拖了。(摘自上观新闻)

建立「谢绝来电」机制不应再拖了

在网上检索可发现,近段时间反映骚扰

学林漫步

□尹稚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有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

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意味着要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在城乡二元化的发展阶段,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成为城市的新移民,进而成为新市民。但这还只是城乡间要素的单向流动,城市不能仅仅成为一个巨大的要素黑洞。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在流入城市后,还要能反向流回乡村,否则乡村就会因要素流出、资源短缺而无法持续发展。推进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需要拓宽城市资源流向农村的通道,让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再汇聚到农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都市圈建设对新型城镇化发挥着更加关键的推动作用。都市圈是城市群的基础形态,是以大城市为核心、与周边具有紧密人口和经济关联的中小城市共同组成的一体化地域空间组织。当前,我国正逐步形成“城市群——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的格局,都市圈正是这个格局中具有枢纽地位的重要一环。建设以中心城市为核心

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意味着什么

的都市圈,可以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促进城市与特色小镇建设、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建设都市圈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需要完善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布局。交通基础设施的成熟能够实现人口分布与产业空间分工的优化协调配置。

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尤其体现在实现更高质量的“以人为核心”。我国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的配置仍以传统的千人指标为参考基准,即考察每千名居民拥有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规格、面积和服务半径等,但这是建立在社区人口结构基本相似、从中心点出发在所有方向上空距离基本相同等假设基础上的。以此为标准的服务设施布局与实际的人口分布可能不完全匹配,容易造成设施资源供需不平衡。实际上,当初设定这一标准,是受技术条件制约的无奈之举。今天,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可以对人口分布、时空距离进行准确分析。实现更高质量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应当重新探索公共服务体系的数量、质量与人口分布、人口结构的耦合关系,推进公共服务体系配置模式创新。

此外,城镇发展还需要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这就要求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确保稳就业增就业。(摘自《人民日报》)

与森林火灾“相处”的日子

中央森林防火总指挥部成立。从1987年9月开始,马坤一直在图强林业森林防火指挥部工作。防火部成立之初,灭火工具十分简陋,只有被称之为2号工具的“皮条子”。“我们都是自己做的,把汽车轮胎扒皮儿,用铁棍子卷上。有时候是用桦树皮条捆着,跟扫帚似的。”

其他装备也很简单。“(灭火队员)上山时背着塑料布和雨衣。军大衣都是很少的,职工一般穿的是羊皮棉袄,带个袋子就上山——不像现在有睡袋,那时候啥都没有。”在山上,灭火队员没有固定住的地方,找块空地,往地上一躺,将就睡上一觉。

1988年,马坤所在的防火办收到了第一批风力灭火机;1990年开始,巡逻直升机开始投入使用;2002年,火灾现场有了气象观测车、移动信息应急车、通信车、野炊车和诸多叫不上名来的设备,甚至连降雨火箭炮都准备好了。

“小时候经常会有森警的防火直升机巡逻,孩子们都会追着看。那种森警的橘黄色,现在印象还特别深。”江安说道,“很多孩子可能上高中甚至上大学之前见过的唯一一种飞机,就是森警的巡逻机。”有一次,一架飞机降落在学校操场,正在上课的孩子纷纷跑出去看,“老师都拽不住”。彼时,学校操场算是镇里为数不多的空旷平坦地方,现如今,镇

里和下属的林场都有小型直升机场。人们的防火意识也在加强,每到防火期,消防车、装甲车和直升机齐出动,进行防火宣传。“大家穿得整整齐齐,站在车上,绕着整个海拉尔(呼伦贝尔市辖区之一)发传单,基本上是车头对车尾,围着整个城市绕一圈,至少有三四百辆车。”与此同时,直升机从天上往下撒传单,地上的人用大喇叭宣传。这阵仗,消防员王涛在2000年做森林消防员前从未见过。

这些都有助于森林防火工作实现重大转变。自1988年以来全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7082起、受害森林面积7.3万公顷,分别比1987年之前下降了55.6%和92.3%。(摘自《看天下》)



科技视野

□杨雪

近日,由4名尼泊尔测量人员组成的团队从加德满都出发,前往珠穆朗玛峰南坡大本营,开始自主测量珠峰高度。据尼泊尔测绘局提供的信息,队员携带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将用传统方法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方式测量。他们和辅助团队需要至少40天才能从南坡大本营抵达峰顶。

作为喜马拉雅山主峰、世界第一高峰,珠峰到底有多高,一直受世人关注。自从1852年英国人用大地测量的方法从印度测得珠峰高度为8840米,并首次确定珠峰为世界最高峰,给珠峰“量身高”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就再也未能停下来。目前尼泊尔认同的珠峰高度为8848米,是印度测量局1954年在1852年测量基础上重新测定的

的方法,基本上把能想到和做到的手段都纳入技术方案,比如利用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测量、北斗卫星测量、重力测量、水准测量等。

2005年珠峰测高中GPS测量包括青藏地区地壳运动GPS监测网,珠峰地区GPS控制网,珠峰峰顶高程GPS联测。三种GPS观测网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是这次测量的一个显著技术特点。

“利用北斗卫星,我们做了气象方面的观测,从细节上综合考虑了测量过程中温度、气压等影响,用气象测量来提高测量精度。”陈现军说。

多种现代技术手段齐上的同时,传统水准测量也至关重要。陈现军介绍,采取一等水准测量,测绘队在珠峰顶树立了一个觇标,即测量标志,从海拔5600米的珠峰大本营附近用多台仪器同时观测觇标。这次测量布下了6个观测点,当精确高程传递到这6个峰顶交会测量点时,通过峰顶的测

测量珠峰“身高”

结果。我国最近一次珠峰测高是在2005年,之后公布的高度为8844.43米。

“我国2005年测定的珠峰高度,是我们用测得的珠峰雪面高度减去了测地雷达测出雪层和冰层的厚度,得到的珠峰岩石高度。”亲历过2005年珠峰测高的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陈现军告诉记者。

珠峰雪面高度怎么测?陈现军介绍,当前珠峰测高采取经典和现代手段相结合

量觇标,运用“勾股定理”的基本原理,推算出峰顶相对于这几个点的高程差。

很多人对珠峰高度常识认知的第一反应是“8848”。这个数据来源于1975年国家测绘局、总参测绘局联合开展珠峰高程测量得到的8848.13米,作为对珠峰高度的采用值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2005年国家测绘局公布:珠峰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8844.43米。

这并不意味着珠峰变矮了。正如陈现军最开始解释的,我国1975年的珠峰测高结果是冰面高度,2005年的结果是去掉了雪冰层后的岩面高度。

实际上,在历次珠峰测量活动中,测量技术的进步程度、峰顶雪冰层厚度的测量精度、珠峰本身的地壳运动都会影响测量结果。所以,不能完全依靠类数据得出珠峰长高或变矮的结论,应通过地学专家的研究作出准确判断。陈现军说,从整体变化幅度看,青藏高原每年在以平均7—8厘米的速度抬升,目前学界的共识是,珠峰还在抬升。(摘自《科技日报》)

